



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

孙江 主编

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

——洪仁玕眼中的『洋』场

「日」仓田明子 著
杨秀云 译

各个知识分子的境遇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共通之处是都具有在开放口岸接触西方科学知识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所谓开放口岸可以说就是当时中国社会「通往西方的窗口」。并且，在这些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一批有志之士，他们有的作为洋务运动的实务者，有的作为报人，他们把所学的知识直接用于中国社会变革。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所见、所经历的「洋」场，不能说是支持中国尝试近代化的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同时，它还是或者后来不断向新革命运动之场。

凤凰出版社



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

孙江 主编

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 与中国近代化

洪仁玕眼中的“洋”场

仓田明子 著

杨秀云 译

凤凰出版社

序 言

21 世纪新的一页已经翻开,20 世纪的课题旧态依然。“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导致近代知识(modern knowledge)的自明性受到质疑;“连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新媒体所带来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根本变化——促使论者反求诸己。如何认知和重构现代知识体系,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近代意义的“知识”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为与人的主观意见相对应、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学问。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关知识的讨论尽皆笼罩于神学之下。因此,17 世纪以来近代知识的发生和生产过程,便是其获得自由之身、摆脱从超自然角度去解释和叙述自然界一切现象的过程。欧洲由此发生了知识革命,大众的、实用的知识表显化之后,经由某种学术体制实现了合法化。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知识的发生来自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传统知识的再生产,传统知识中蕴含的近代性要素,是其得以实现近代转变的原因所在;另一个是西方近代知识的移植,即“他者”逐渐内化的过程,其中包括翻译、接受、变异等再生产环节。

其实,若将中国历史放在 16 世纪以降全球史的语境下加以考察,不难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全球旅行和相互影响的现象——“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简言之,16 世纪末以降耶稣会士

2 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

将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后,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对于中国的认识,此乃“宋学西迁”之结果;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形塑了近代中国人的自我/他者认识,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大举东渡,移植日本西学知识(包括传入日本的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又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是谓“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还。

基于上述视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全球视野、本土实践——角度推动近代知识变迁的研究。目前正在推进一项大型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即“影响中国及东亚政治—社会的100个关键概念研究”,旨在梳理中国近代知识的谱系,前瞻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这套《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即为部分前期工作的结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以及后面还将推出的更多成果,能为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是为序。

孙 江

目 录

序章 开放口岸的诞生——中国社会的“洋”场	1
第一节 西方知识的传播与“开放口岸知识分子”	1
第二节 口岸知识分子——洪仁玕	10
第三节 本书的课题和构成	13
第一章 基督教布教的开始与展开	17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布教	17
(一) 基督教开始布教的背景	17
(二) 马礼逊在广州、澳门的布教活动	20
(三) 新传教士的派遣和向中国内地布教的准备	23
第二节 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基督教布教的开展	30
(一) 鸦片战争与传教士	30
(二) 香港、广州布教	34
(三) 上海布教的开展	44
第三节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	46
(一) 马礼逊与裨治文的“信徒观”	47
(二) 麦都思及修订《圣经》的争论	55
(三) 郭士立与福汉会	59

第二章 洪仁玕与基督教	64
第一节 太平天国运动与基督教	66
(一) 洪秀全与《观世良言》	66
(二) 上帝教与基督教	73
第二节 洪仁玕与巴色会	79
(一) 洪仁玕的基督教受容	79
(二) 南京合流的初次尝试	84
第三节 洪仁玕与伦教会	93
(一) 作为伦敦会助手贡献卓越	93
(二) 启程去南京	102
第三章 口岸知识分子的诞生	107
第一节 王韬与墨海书馆	108
(一) 王韬的基督教受容	108
(二) 墨海书馆的信徒团体	112
(三) 王韬与基督教	121
第二节 《遐迩贯珍》与《六合丛谈》	126
(一) 英华书院、墨海书馆印刷事业的发展	126
(二) 《遐迩贯珍》与口岸知识分子	128
(三) 《六合丛谈》与口岸知识分子	135
第三节 墨海书馆对西方知识的传播	138
(一) 自然科学、医学、地理书籍的出版	138
(二) 墨海书馆知识分子关系网的扩展	140
(三) 墨海书馆环境的变化	144

第四章 《资政新篇》与基督教	149
第一节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149
(一) “干王”的诞生与《资政新篇》	149
(二) 《资政新篇》的另一种存在	150
第二节 《资政新篇》的修正与改变	154
(一) 抄本《资政新篇》的修正	154
(二) 《资政新篇》发行之际的改变	158
第三节 洪仁玕上海、香港经历的体现	165
(一) “用人察失类”	168
(二) “风风类”	169
(三) “法法类”	171
(四) “刑刑类”	183
第五章 洪仁玕与太平天国	185
第一节 太平天国后期的对外关系与洪仁玕	185
(一) 外交改革与局限	185
(二) 欧美社会对太平天国的批判	192
(三) 洪仁玕形象在欧美社会的变迁	193
第二节 太平天国后期传教士的活动与洪仁玕	198
(一) 罗孝全迁居南京	198
(二) 伦敦会传教士的往来	201
(三) 罗孝全逃离南京	210
第三节 洪仁玕的宗教改革	212
(一) 洪仁玕在南京的改革	212
(二) 《资政新篇》之后宗教改革的尝试	217
(三) 洪仁玕与上帝教	223

第六章 口岸知识分子的崛起	228
第一节 一八六〇年代前期社会变容与口岸知识分子	228
(一) 王韬与太平天国	228
(二) 曾国藩的幕僚们	234
(三) 中国人教会在香港的发展	237
第二节 新知识在开放口岸的传播	244
(一) 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事业与格致书院	245
(二) 香港华文报纸的发行	251
(三) 知识分子信徒与《教会新报》《万国公报》	257
第三节 香港基督徒精英的崛起	266
(一) 香港官立学校改革与教会学校	267
(二) 非官职华人议员的诞生	268
(三) 孙文与香港的基督徒共同体	273
终章 开放口岸与近代——通往中国的入口、通往西方的窗口	276
第一节 基督教布教与基督教受容	276
第二节 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	279
第三节 关于洪仁玕及太平天国的评价	283
参考文献	289
开放口岸人物关系图	314
附表	316
后记	340

序章

开放口岸的诞生 ——中国社会的“洋”场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朝统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洪仁玕和洪秀全幼年时便已熟识，而洪仁玕却一直未参加洪秀全领导的早期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起义后，他背井离乡逃亡至香港和上海。后来洪仁玕和南京的太平军合流，成为后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他主张引进西方先进制度推进“近代化”，因此备受瞩目。晚年洪仁玕称自己在香港、上海的经历是“遍游各洋”^①。对洪仁玕来说，香港、上海是“洋”场。

本书主要论述备受瞩目的“洋”场——香港和上海，以及“洋”场的知识分子。

第一节 西方知识的传播与“开放口岸知识分子”

香港和上海之所以被称作“洋”场是由于鸦片战争失败后于1842年缔结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五处作为开放口岸，与西方各国通商。在这五个港口设立外国人居留地，香港及以上五个港口

^① 洪仁玕“亲笔供”。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关于洪仁玕供述书的详细记载参照本书第二章。

2 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

城市成为中国与西方各国贸易的场所,在这些城市居住的外国人也和中国人进行日常交流。本书关注中国和西方交流的“场”的功能,将《南京条约》产生的香港、上海等贸易港口称作“开放口岸”。尤其是本书重点讨论的香港和上海作为中国和西方人才、物资、信息的集聚地,它们是迅速发展起来的“开放口岸”。当然,“殖民地”和“贸易港口”两者之间存在法律、制度方面的差异,本书的关注点是两者具有共通性的“场”,香港的“殖民地性”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特此说明。

在开放口岸这个“场”内发生的诸多事件中重点研究“西方知识”的传播。本书的“知识”,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还包括源于国家、社会的制度、思想及宗教等。因此,“西方知识”指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科学体系、制度、思想、宗教等。本书重点论述 17 世纪至 19 世纪,完成近代化的“西方知识”是如何被引进到中国的。

研究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基督教,尤其是 19 世纪初开始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如果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近代看作是“欧美市民社会的一种‘普遍性’原理席卷非欧美世界,并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秩序”^①的话,那么基督教的传教士推动了这种席卷中国的“普遍性”的传播。当时较早和中国交往的是英国,有学者认为英国人“把自己看作最文明之国,他们认为其他世界都是‘未开之地’和‘野蛮之地’,自己有义务和他们共享先进文明”,即“文明化使命”使然^②。这种使命感产生了一种宗教信念,就是通过

① 并木赖寿:《近代の日本と『アジア主義』》,《東アジアに「近代」を問う》,研文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② 东田雅博:《大英帝国のアジアイメージ》,密涅瓦书房,1996年,第1页。

基督教,尤其是耶稣的“福音主义信念”,对那些“野蛮人”的“海外异教徒”的“落后性进行合理解释”,“上帝选择的国家”——英格兰的基督教把他们引导到进步和救赎的道路上来。^①同时,基督教的信仰与思想“随着西欧、美国等国家的近代社会与文明的发展不断进步,形成了基督教的精神基础”,^②可以想象不仅英国传教士有“文明化使命”的思想,欧美的传教士们或多或少也有这种观念。对传教士“文明化使命”意识的研究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事实上,19世纪以来中国的传教士不仅是基督教的传播者,同时还是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等介绍到中国的先驱。如上文所述,传教士在翻译的科学书里“有意识地穿插了基督教的教义”,^③19世纪兴起的各种西方近代知识向中国的传播,是以基督教传教的形式开始的。

目前关于基督教和西方知识的传播,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广学会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受到较多关注。的确,无论从出版物的数量还是影响力来看,此时段传教士的活动影响最大。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开始传播西方知识,并不断扩大受众群体。本书重点研究西方知识传播的连续性,并关注这种连续性开始的时代背景。

本书首先讨论19世纪中国基督教史,与20世纪以降相比,19世纪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较少,基督教史研究多集中在19世纪后期频发的反基督教运动,即教案。教案大都与天主教相关,最近日

① 山中弘:《海外ミッションの展開と大英帝国》,杉本良男編《福音と文明化の人類学的研究——“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31》,“国立”民族博物館,2002年,第65—66页。

② 山本澄子:《中国キリスト教史研究(増補改訂版)》,山川出版社,2006年,第7页。

③ Elman, Benjamin A.,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xxvii.

本的渡边祐子、佐藤公彦对基督教教案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① 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史是“受容”与“排斥”的历史,重点讨论了作为“排斥”代表的义和团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 19 世纪后期的教案,他们认为教案和当时复杂的对外关系有关,并基于区域社会本身具有的社会背景及社会问题重新论述了各教案。本书重点研究融入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在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面相,这与渡边祐子、佐藤公彦的研究视角产生了共鸣。最近,对中国区域社会的研究逐渐增多,并出现了通过研读基督教相关史料(差会档案和基督教杂志等)研究中国社会的相关成果。^② 本书重点研究“中国南方”社会与基督教的相关问题,主要关注基督教自由地传入中国社会之前,在脱离原有区域社会的开放口岸所产生的狭义空间内的传播情况。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教史,本书不是按照区域社会的脉络,而是从个体层面探讨这些个体与基督教的接触情况。个人接触基督教时产生的隔膜,或者超越这种隔膜的理解和受容,这与后来基督教向开放口岸以外地区的传播过程几乎相同。也就是说作为开放口岸经历的延伸,后来中国社会和

① 渡边祐子:《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プロテスタント伝道——「反発」と「受容」の諸相》第二章“清末扬州教案——内地会传道与中国社会的‘反抗’”,东京外国语大学,2006年。佐藤公彦:《清末のキリスト教と国際関係》第三章“1895年福建、古田教案”及第四章“1895年四川成都教案”,汲古书院,2010年。19世纪,日本关于中国教案的前沿研究有里井彦七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衆運動とその思想》第二章“19世纪中国的仇案运动”,东京大学出版社,1972年。关于19世纪教案研究视角的论考有孙江:《近代中国の宗教、結社と権力》第二章“作为‘洋教’的他者”,汲古书院,2012年。孙氏指出需要关注超越单纯“宗教冲突”的“地方上宗教感情矛盾与日常生活斗争”(第69页)。

② 从中国区域史视角探讨基督教史的研究可参考《历史评论》765号(2014年1月号)特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区域社会史”所收录的文章。尤其是浦丰彦的《中国の地域研究与キリスト教》(第6—16页)论述了区域史与基督教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基督教相遇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本书讨论了更长时期内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接触过程。

本书的研究时期是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关于该时期早期基督教史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利用差会档案等原始史料深化历史学的研究,如日本的吉田寅关于基督教传教文书的研究、传教士发行的月刊杂志等文献学领域的成果;^①还有前文提及的渡边、佐藤在欧美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受容”“排斥”论,他们认为“受容”代表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②另外,也有少数关于个别传教士的传记研究。^③中国大陆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也以传教士的传记和概论为主。^④中国香港的李志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早期基督教史的研究,作者在厘清基本史实关系的基础上,积极评价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并论述了教育、出版等与基督教的关系。^⑤

① 吉田寅:《中国キリスト教伝道文書の研究——『天道溯原』の研究・附訳註》,汲古书院,1992年;《中国プロテスタント伝道史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沈国威编著:《『六合叢談』(1857—1858)の学際的研究》,白帝社,1999年。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邇貫珍の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

② 渡边祐子:《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プロテスタント伝道》第三章“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受容’”。佐藤公彦:《清末のキリスト教と国際関係》第一章“近代中国基督教布教与区域社会”。

③ 都田恒太郎:《ロバート・モリソンとその周辺》,教文馆,1974年;《ギョツラフとその周辺》,教文馆,1978年。深泽秀男:《中国の近代化とキリスト教》,新教出版社,2000年,该书列举了太平天国宗教、西方传教士及华人信徒,并整理了国内外研究成果。

④ 代表性专著有: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20世纪中期之前只局限于广东地区相比,学者在更广范围内进行了比较,如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出版社,2002年。

⑤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道声出版社,1987年;《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

欧美有大量关于传教士和基督教差会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详细论述了个体和各个布道会的具体情况。^①然而,上述成果仅仅是个别事例研究的积累,尚未达到对个人与差会的共时研究,没有从整体上论述该时期的基督教史。本书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关注上海、香港等开放口岸这一“场”,从整体上论述基督教传教史,包括个体与开放口岸的渊源等。

要研究中国对西方知识的接受过程,首先需要关注传教士是如何理解与对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对西方知识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翻译西方书籍(包括基督教的传教书)进行的,传教士的翻译意识非常重要,已经有关于基督教和翻译争论的相关成果。^②本书关注具有翻译意识的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论述传教士

① Coughlin, Margaret M, Ph. D., “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72.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 - 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1996.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Lazich, Michael C., *E. C. Bridgman(1801 - 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Lutz, Jessie G.,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 - 1852*, Eerdmans, 2008. 另外,与19世纪基督教传教相关论文集有 Bays, Daniel H.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Univ. Press, 1996.

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基础文献,请参考仓田明子、魏郁欣:《中国キリスト教史基礎文献・所属機関案内》,《歴史評論》765号,第68—76页,其中包括上述所列部分文献。

② 代表性先行研究有:柳父章:《ゴッドと上帝——歴史の中の翻訳者》,筑摩书房,1986年。近几年的研究有:黎子鹏:《经典的转世——晚清〈天路历程〉汉译研究》,基督教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社,2012年,该书研究了日韩基督教与翻译问题。金成恩:《宣教と翻訳——漢字圏・キリスト教・日韓の近代》,东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作为西方知识传播者的作用。

明代开始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促进了西方知识向中国的传播。然而,清代实施禁止传播基督教的禁教政策(1723年)及严格限制与外国通商的禁海政策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急剧减少,没有传教士传播西方知识了。^① 当时,在西方各国中,英国首先完成产业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世纪把西方信息带到中国的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士。本书重点讨论中国近代知识的传播与基督教的关系,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以及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据点——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澳门,不是本书的讨论内容。本书的“基督教”指“耶稣教”。

作者关注西方知识的传播者——传教士,更关注接受西方知识的中国人。前文提及的关于基督教史的先行研究仅论述传教士,而与传教士日常接触的中国人信徒却鲜有涉及。最近十几年作为最新研究动向,出现了运用传教士寄往差会本部的报告书等差会档案来论述传教士身边的中国信徒的研究成果。^② 当然,这些史料都是传教士撰写的,报告中的中国信徒只是传教士眼中的形象,报告书的内容只是需要或者可以汇报的内容,这是以上史料的不足之处。其中也有中国信徒撰写的报告或书信被翻译后夹在报告书中,通过解读这些日常写成的史料,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中国信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6页。

^② 代表性研究有:Lutz, Jessie G. and Rolland Ray Lutz, *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850—1900*, M. E. Sharpe, 1998. Klein, Thoralf, *Die Baseler Mission in Guangdong (Südchina) 1859—1931*, Munchen, 2002. 苏精:《上帝的人马:19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年。拙稿《洪仁玕とキリスト教——香港滞在期の洪仁玕》(中国研究月報,中国研究所,641号,2001年,第1—21页)根据伦敦教会档案论述了洪仁玕在香港期间的各种活动。

徒的情况。差会档案是本书不可或缺的信息源。

仔细研读差会档案等相关史料,可以发现和传教士相关的中国人不只是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信徒。这不仅是基督教的问题,讨论和基督教紧密相关的广义上的“西方知识”如何被中国人接受这一问题时,知识分子是不能忽视的群体,他们虽然不是信徒,但在与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吸收了新知识。他们有的成为推动洋务运动的人才,学界把这些知识分子称作“条约港知识人”。佐藤慎一认为,“条约港知识人”即“童年时期为考取功名刻苦钻研学问”,后来或“科举落第”,或“搬到上海等开放城市,经营企业或从事新闻工作等新职业”的人,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①另外,也有学者把清末推动一系列改革运动的中坚知识分子分为“沿海地区(Littoral)的改革者”——容闳、何启、唐廷枢、伍廷芳等和“内陆地区(Chinese hinterland)的改革者”——冯桂芬、薛福成、黄遵宪等,还有中间地带的改革者——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②最新研究成果有:手代木有儿从洋务运动时期传教士传播的西方事情激增而引起知识分子世界观变化这一视点出发,通过该时期比较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溯他们对世界认识的变迁。^③本书涉及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前文所述“条约港知识人”、“沿海地区的改革者”和中间地带的知识分子,主要论述1870年代、1880年代以降这些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是如何立志改革的。在以传教士为中介的对西方知识的传播和接受这一意义上来论述的话,可以上溯到洋务运动,在其连续性中理解这些知识人。

①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东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② Cohen, Paul 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44.

③ 手代木有儿:《清末中国の西洋体験と文明観》,汲古书院,2013年。